

新发展理念与中国道路的逻辑关联

胡运海, 胡绪明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念。新发展理念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 直面中国现实问题, 破解中国发展难题, 体现了中国道路的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有机统一; 秉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锐意进取、革故鼎新的精神气质, 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彰显了中国道路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萃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精华, 深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 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哲学, 体现了中国道路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意义的统一。通过对新发展理念与中国道路之间内在逻辑的学理分析, 有助于进一步深刻领会中国道路究竟在何等意义上创造了中国奇迹及其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新发展理念; 中国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D 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0)03-0261-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0.03.011

On the Logic between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Chinese Road

HU Yunhai, HU Xumi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Xi Jinping's socialism thought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oncept is based on the Marxist perspective, viewpoint and method to face China's real situation and solve China's development problems, which embodies the organic unity of the goal-and-problem orientation of China's road. The concept adheres to the Chinese nation's spirit of self-improvement, determination and innovation, sets road plan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ighlights the epochal nature of China's road. The concept created a philosophy of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ed the unity of China's wisdom and China's meaning, which profoundly comprehended manifested the unit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essence of Marx's theory, the law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the law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ruling la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logic betwee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nd the Chinese road, it is helpful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road in creating the Chinese miracle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pla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move towards modernization.

收稿日期: 2019-11-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重点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团队建设研究”(19JDSZK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运海(1993-), 男,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 625501418@qq.com

通信作者: 胡绪明(1973-), 男, 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E-mail: huxm1973@126.com

Keyword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Chinese roa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社会现实,站在时代前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这一新理念不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而且更显示出我们党着力攻破发展难题、加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自信。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理念和基本出发点,总结国内发展实践,借鉴国际发展经验,适应时代前进方向,通过对发展规律的持续丰富和完善而提出的重要创新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完成“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阐明了新发展理念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所具有的纲领性作用。新发展理念与中国道路具有内在耦合性并有着深刻的逻辑关联:新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道路的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蕴含着中国道路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彰显了中国道路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凝结着中国道路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意义的统一。

一、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的统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30}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指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体现了新发展理念是中国道路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辩证统一的结果。

第一,基于世情、国情、党情,以推动国家长远发展为目标,将创新发展置于新发展理念之首。当前,虽然我国在经济上获得重要成就,民主政治取得突出成绩,思想文化成就显著,生态文明建设也卓有成效,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但是,我们依然需要看到我国发展仍存在众多缺陷和不足,依然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比如,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民生领域的短板问题、城乡发展和收入差距问题、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国家安全问题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看清问题,设定目标,才能解

决问题。处在新发展理念第一位的创新发展理念就是面对突出问题,设定清晰目标而提出的重大发展方式之一。

第二,基于国内与国际不协调现实,以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为目标,提出协调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存在着发展协调性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从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找到。除了国内发展不协调之外,在对外交流中依然存在不协调问题。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稳定离不开发展的协调性、规划的统筹性和战略的全面性。协调作为新发展理念之第二位,突出彰显了党中央集体对国内外发展的前瞻性把握,做到了问题意识与目标导向的统筹兼顾。

第三,基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生态文明,倡导绿色发展。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一直以来就应该是和谐共生关系,而不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类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然而,在几十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生态破坏问题愈发严重,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人们对空气质量、水源和食品安全以及生存环境的要求也愈加强烈。因此,绿色发展就是在经济建设中引导生态环境的适宜性,强调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既直面了生态环境问题,也彰显出生态宜居社会建设的价值目标。

第四,基于国内和国际发展近况,以国家进一步繁荣、社会进一步发展为目标,提出开放发展。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在历史长河中,无论哪个国家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开放,那些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想法是要不得、使不得的。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必然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开放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正是认识到封闭带来的后果与危害以及开放带来的正面效应,提出将经济开放提升到更高水平,不断将开放发展做深做实。

第五,基于分配不公、人民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的现实,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诸多成果,提出共享发展。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贯彻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把人民放在核心位置,坚持把工作扎根到群众,向人民群众学习,以更好地服务于

人民。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展现了一个人民性政党的价值和人文情怀,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新发展理念不仅系统地描绘了中国道路发展的五个向度,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中国道路发展的五大目标导向: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优结构的整体发展,明确回答了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二是解决发展内在动力机制难题,化解各方面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消解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恶化问题,通过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和永续发展、内外互通联动以开拓发展空间,通过化解发展的包容性、普惠性问题以达到社会的公平正义,明确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三是把质量效益、创新驱动、公平公正、绿色发展和对外开放提到更高位置,明确回答了“怎样发展”;四是突出了发展的目的在于人民,把人民作为发展的力量源泉和动力基础,让人民群众切实共享社会发展的积极成果,这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国道路发展的核心价值在于增进人民福祉,实现人民幸福,诠释了发展的人民性即“发展依靠谁、为了谁”。

二、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准确把握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这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的工作方法。”^[2]这表明,新发展理念彰显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目的性与规律性、“要”与“能”之间的辩证关系,既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契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一方面,新发展理念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发展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生态规律、文化规律,遵循了国家发展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规律,并在此规律上设定发展目标。具体而言,创新发展,契合了现代化的经济体系规律,符合历史进步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3]198}当前,经济稳定离不开创新,创新针对的是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创新来更好地驱动发展,从而提升我国的

经济发展活力。协调发展,契合了发展的整体性规律。它针对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而提出,注重经济发展的整体成效,其目的在于不断巩固和强化经济发展的系统性。绿色发展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面对人类日渐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然遭到日渐破坏的情况,提出绿色发展,其目的在于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的贡献。开放发展符合世界历史方向,契合经济全球化规律。“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3]210}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基于此,我们党选择继续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完善对外开放的区域化建设、国际贸易规划和投资规划,形成良好持久的开放能力。共享发展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符合人民发展规律和共同富裕规律。它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目标,以共享的目标全民性、内容全面性、主体共建性和进程渐进性为基本要求,不断提升发展的普惠性、人民性。

另一方面,新发展理念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展现了当下中国关于社会发展的政治文化目标。任何发展都有其文化因素,是由一定的文化价值观所主导的,任何发展的行为、手段、方式只有内化为一种价值文化,才可以成为一种稳定的、自然的、不因时空变化而变化的历史文化遗产。当代中国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其基本的价值基础是社会主义,其直接的价值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人民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首要的、根本的观点,实现人民独立、人民解放、人民幸福,是党一以贯之的目标和宗旨。正是围绕这个宗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中心的时候,特别强调时时处处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发展是硬道理到可持续发展,到科学发展,再到新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问题上始终坚持人民性与创新性辩证统一的深刻智慧。让人民富裕,使人民自主,谋人民幸福,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作所为内容的基本概括,发展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新发展理念综合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理念和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精华和实践智慧,符合中国人民的愿望与呼声,把发展理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是我们党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断变动的国际形势和多元化时代潮流做出的科学决策,同时也生动体现了追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民为邦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凝结着浓厚的民族特性,彰显出中国道路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

新发展理念立足中国现实,诊断中国问题,聚焦问题导向,谋划精准施策,彰显了中国道路的时代性。具体地说,创新发展着力解决的是发展动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严重问题,旨在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全面跃升;协调发展着重解决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之间,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以及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协调发展,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绿色发展着力要解决的是人同自然的矛盾问题,旨在建设美丽中国,强调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重推动绿色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开放发展着重要破解的是内外双向互动困境,深化和拓宽开放的新格局,谋求中国社会经济更大的生长空间;共享发展着重要解决的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通过实现全民共建共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的这种时代性价值鲜明地体现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制度优势。我们党充分运用“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体系,构建群防群治、联防联控机制,不断推动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向网格延伸,这一创造性的防控措施是疫情防控工作获得决定性成效的重要因素,彰显出新发展理念所蕴含的智慧和力量。此外,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这一问题,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可以明确的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是致使疫情发生的原因之一。基于此,疫情带来的启示之一就是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氛围。病毒无国界,那种关起门来研究治疗药物,切断国外合作往来的做法无疑是不可取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

开放发展理念是对上述错误做法的取代,也是对国际合作、共同战胜疫情、共同开放发展的引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态势居高不下,全世界人民必须共同应对,共享防控信息,共享防控经验,共享各类紧缺物资。只有秉持共享发展理念,才能有效抑制疫情发展态势,这进一步显现出新发展理念之共享发展。综上所述,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践行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瞻远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性。

新发展理念彰显了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深厚的民族特性,不仅仅是纯粹经济学层面的发展理念,同时还蕴含着当前我们所走的中国道路的民族底蕴,彰显了民族性。具体而言,谋求创新发展,反映了中华民族亘古以来自强不息、锐意进取、革故鼎新的优秀品格;谋求协调发展,展现了中华民族顾全大局、放眼世界的民族气魄;崇尚绿色发展,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恪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民族气质;谋求开放发展,展示了中华民族永无止境、风雨兼程的优秀民族特点;谋求共享发展,昭示了中华民族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天人合一”“天下太平”“天下大同”“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以及“民为邦本”的传统民本思想。总之,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在现时代的展现和弘扬,在其整个逻辑理路中处处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底蕴和民族气质。

四、中国智慧与世界意义的统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继承发展、开拓创新,也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

智慧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意义在当前中国的具体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4]新发展理念具有宏阔的国际视野、世界眼光,鲜明标注“世界历史”的视域,无论这其中的哪一项发展理念,无不深刻体现着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向、脉动所在。创新发展是对过去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的变通与革新,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世界前沿的伟大实践,“坚持创新发展,是我们分析近代以来世界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对发展环境变化、增强发展动力、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好引领新常态的根本之策”^[5];协调发展,侧重于发展的全面性、联系性,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前人智慧提出的最新治国理政理念之一;绿色发展,不仅是汲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发展后污染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成果,而且是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深刻反思,除此之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生机理也不断凸显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开放发展,则更着眼于用好国内外两个市场和资源,成就更高层系的开放型经济,是统筹国内外全局的必然结论;共享发展,突出了发展的普惠性,避免了社会发展的硕果由少数人独享的局面,凸显了让更多人民群众共同享有改革的发展红利,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享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特别地体现了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及其对其他国家所提供的经验借鉴。总之,新发展理念既是对全球治理经验教训进行的反省和总结,又是对全球发展理念的深化和升华;既促进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良性互动,又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理念、做出新贡献。

五、结束语

新发展理念萃取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精华,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哲学,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首先,五大

发展理念不仅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一方面,作为系统的世界观,它不仅深刻阐明了客观物质世界具有不断运动变化的特性和开放包容性,也说明了人与自然的生态完整性,从而更深刻地指出世界的和谐性与共生共存性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这是我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从而更好地理解世界的根本观点;另一方面,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它阐明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位一体的科学方法,同时包含着从整体出发的系统思维、普遍联系的辩证思维、综合集成的思维以及矛盾分析法等内涵,这是我们分析和把握世界从而改变和变革世界的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有利于我们树立坚持和推动创新、重视和关注协调、提倡并实现绿色、推进和维护开放、坚持和完善共享的方法论自觉与行动自觉。其次,新发展理念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党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核心位置,坚持把工作深入到群众、扎根于群众,积极向人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地服务于人民。在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尊重和倾听群众的意愿,表达并实现人民的意志。在发展步骤的设定上,向人民问策、向群众求教。在发展目标的追求上,满足群众的需求,坚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次,新发展理念更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这一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更加深入的认识和高度的理解,是我国发展理论的再一次重要创新。它不仅表达了党对新的发展时期主要特点的科学洞察,更展现出对社会主义根本要求以及发展向度的科学掌控。

新发展理念不仅是中国道路的发展理念和治国理政的行动纲领,同样也对化解当今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世界性难题,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瓦解资本逻辑及其全球霸权,突破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围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创新是全球进步的重要推动因素。创新旨在通过体制机制变革激发创新活力,通过科技进步创造新产业、新业态,形成经济发展新优势,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困局,打破“中等收入陷阱”,故创新发展是关键;协调是世界向前发展的内生需求。提出协调发展理念,主要是要破解中国长期存在的内部不协调问题,形成平衡结构,加强和巩固发展整体性。在当今时代,发展不协调问题具有广泛性、持久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强国经济政策的外溢

效应是明显的。正是洞察这一时代性的经济规律,“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才更有力量。中国正在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协调发展,正是协调思维、合作思维和共赢思维的具体表现。开放是世界潮流的必然趋向。在世界经济高度互动的新阶段,一个国家的发展不能脱离世界,不能离开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更不能脱离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格局,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共享是世界发展的人民期盼。让人民享受发展带来的福祉,是世界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任何国体国家的一致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联合国发展峰会上所指出的,唯有发展,才能消弭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这充分反映了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心声和强烈愿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2] 习近平.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EB/OL]. (2015-01-26)[2019-07-10]. http://www.china.com.cn/guoqing/2015-01/26/content_34655990.htm.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4] 习近平. 习近平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EB/OL]. (2018-08-21)[2019-07-1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8/21/c_1123302767.htm.
- [5] 习近平. 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EB/OL]. (2019-05-16)[2019-07-10]. 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19-05/16/c_1124491225.htm.

(编辑:朱渭波)

(上接第248页)

让他意识到自己对“白人性”的理解有所偏颇。对于麦克斯的倾力相助,别格的内心深处掀起了一阵波澜,让他意识到“白人性”与“黑人性”并非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而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因此,认识到“白人性”的片面化指向,能够帮助黑人摆脱刻板印象的束缚,缓和“黑人性”与“白人性”之间的对抗性,进一步消除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

参考文献:

- [1] 谭慧娟,罗良功. 美国非裔作家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6.
- [2] 王晓路. 种族/族性[J]. 外国文学,2002(6):62-66.
- [3] 乔国强. 美国40年代黑人文学[J]. 国外文学,1999(3):63-69.
- [4] 曹颖哲. 黑人性与犹太性:莫里森和贝娄小说中族裔特性之异同[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4):125-127.
- [5] 陈融. 论“黑人性”[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30-35.
- [6] 于冬云. “准则英雄”与“他者”——海明威的早期创作

与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种族政治[J]. 当代外国文学,2009(1):133-147.

- [7] 王晓路. 差异的表述——黑人美学与贝克的批评理论[J]. 国外文学(季刊),2000(2):3-9.
- [8] 董雪飞. 身体·性别·主体:论《看不见的人》对黑人性的操演[J].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15(5):108-112.
- [9] 陶家俊. 后殖民[J]. 外国文学,2005(2):59-64.
- [10] COTHRAN T C. White stereotypes in fiction by negroes[J]. Phylon,1950,11(3):252-256.
- [11] 谭慧娟.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理查德·赖特及其文学创作中的现代主义特征[J]. 外国文学研究,2010(1):56-64.
- [12] 朱晓兰. “凝视”理论研究[D]. 南京:南京大学,2011.
- [13] 张云雷. 黑人的平等人性和政治智慧——《切雷诺》中的革命[J]. 沈阳大学学报,2017,19(4):496-500,512.
- [14] 理查德·赖特. 土生子[M]. 施咸荣,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编辑:朱渭波)